

彭家珍 向清王朝发出最后一击

他是中国同盟会历史上最后的刺客，完成了近代革命历史上关键的一击——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扫除了革命的绊脚石，成功逼迫清帝退位。为国捐躯后，孙中山追封他为“陆军大将军”，毛泽东亲自为他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他就是彭家珍，一位载入史册的刺客。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事迹，能获得孙中山与毛泽东两位伟人的高度评价？

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彭家珍是四川金堂人，父亲彭世勋秀才出身，以塾师为业，主张维新和实业救国。也正因此，彭家珍8岁时就得启蒙，由父亲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父子间的和谐，却在其父于1902年赴成都一书院任教后打破，少年彭家珍在省城中开拓了视野，开始怀疑改良，趋向于激进革命。

次年，彭家珍考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1906年春，彭家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时，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让他“带着任务返川”，这个任务不言自明——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彭家珍回国后，先是在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实习，后在新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排长。

1907年，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人员密谋起义，后被奸细告密。军阀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随后派新军搜捕革命党人。彭家珍借机入城，他设法将这个信息通知了革命党人，同时掩护了革命党人的转移。为此他被当局列入怀疑对象，但他凭借机智沉着将事态化解，洗脱了嫌疑，后来还调回六十六

标左队任连长。

1909年，彭家珍在武备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未婚妻的舅父张蓬山在云南升任协统，邀他去工作。彭家珍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意在以大官亲戚为依托，自己可掌握更多权力，为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便利，于是欣然前往，先是担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随后升为提调。

可是仅隔半年，张蓬山便在官场上失势，随营学堂也遭撤销，彭家珍随之失业，他听说东北革命气氛浓郁，便直奔沈阳。

初至沈阳时，彭家珍找不到工作，盘缠又用尽，十分困顿，好在同盟会会员刘介藩帮他找了一份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队官的工作。

这期间，他利用挑选学兵之机，将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李培基、李忻、张揆一、张绍玺等选入他所管的队中，并发展了一批学兵加入同盟会，常去周边驻军向基层官兵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东北举事，许多骨干都与彭家珍有联系。

可不久，奉天讲武堂学兵营又遭停办，彭家珍再次失业，但东北的革命形势让他斗志昂扬，尽管父亲屡屡写信催他回四川与未婚妻完婚，他均一一拒绝，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如花美眷不能让他返乡，但彭家珍却时刻关注着家乡的革命之火。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他预感革命大潮即将袭来，便前往京津两地考察形势。1911年9月底，他返回沈阳，筹划在东北起义。

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

尽管彭家珍将众多革命党人送入

学兵营，又发展了大批人进入同盟会终日宣传革命，可始终未曾暴露，反倒和当时的学兵营管带崇恭关系甚好。彭家珍跟其他上司关系也甚密，被视为“可靠之人”，他参与了清廷陆军部的考试，位列一等第一名，得授相当于四品的正军校衔，并借此谋得军谘府要人处的推荐书，又通过自己在沈阳的“良好关系”，被委派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几天到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彭家珍利用职务便利，频繁来往于京城与奉天之间进行联络，他这个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实在贡献极大。比如1911年10月底，清廷为有效镇压起义新军，从德、法等国购入了大批军火，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武汉前线。在沈阳中转时，彭家珍是押运人员之一，负责其中一列车厢，看管5000支枪、500万发子弹。他秘密联络驻守滦州的革命党人，打算说服当地守官张绍曾，让张在军火到达滦州时帮忙截停。彭家珍还从天津兵站私取上万元巨款，支持革命党人发动滦州起义，为革命党人行动方便，他还私取了大量军用车票供其使用。

但这些秘密工作做多了，不免暴露。后来彭家珍再次挪出一批枪支、军粮和资金，以供起义之用，不幸被发现，他迅速逃离，自此被清政府通缉，化名在京津奉等地秘密活动。不过，他在东北的影响力，连袁世凯都曾为之慨叹：“二十镇中下级军官多出其（彭家珍）门。”

“一炸胜似雄兵十万”

1912年1月，清室贵族良弼等人召开会议，随后于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组织“宗社党”，开始积极活动，意在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良弼作为清廷权贵中难得的干才，清晰地看到了袁世凯的用心，他组织宗社党，便是意图夺回权力。

宗社党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良弼更是放言“三月内尽灭起义军”。此时，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彭家珍已然返京，策划刺

杀行动，在刺杀袁世凯未遂后，便有了刺杀良弼的想法。

彭家珍并不认识良弼，行动前，他需要清楚良弼的相貌和掌握良弼的生活、工作习惯。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进入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寻找有关信息。

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的办法是冒名顶替。他在沈阳认识的那个叫崇恭的清军官员，是良弼的亲信。彭家珍购来全套清军官服，冒充崇恭去拜访良弼，借机下手。第一次拜访良弼时，彭家珍在远处见良弼出大门了，然后刻意在此时上门。如此，混个脸熟，让良弼家的人都知道崇恭来拜访，下一次来就不会起疑心了。

1912年1月26日是农历腊八，清廷在这个日子有馈赠腊八粥的礼俗，良弼有可能要借此机会与友人聚会，彭家珍意识到这是刺杀良弼的绝好时机。当晚他得到情报：良弼等次日将集合讨论如何对付南方革命力量。夜11时，彭家珍提前在军谘府勘察，但未见到良弼，便立即奔赴良弼官邸打探。

彭家珍在良弼府中得知良弼并未在家，就准备再往其他处寻找。当行至距良弼家不远处时，他一眼看到良弼的马车回来了，便立即追了上去。彭家珍先递上拜见帖子，卫队和门卫均没有怀疑，当彭家珍走到良弼跟前时，良弼才发现这人不是崇恭，感觉大事不妙，大喊一声：“抓刺客！”话音未落，一枚炸弹扔了过来，良弼被炸伤左腿，随之摔倒在地，但人仍是清醒的。

爆炸时，彭家珍因与良弼距离太近，一片弹片击中他的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4岁。

次日，良弼做了截肢手术，但终究没能救回，于两天后去世。

“良弼刺杀案”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隆裕太后、宣统皇帝等皇室人员本来对良弼和宗社党抱有一丝希望，良弼离世，连最后的希望也没了。17天后的2月12日，清廷对外宣布了“清帝退位诏书”

事件发生后，南方各大报纸称：“一炸胜似雄兵十万”。

据《同舟共进》叶克飞/文

聂耳义助“小毛头”卖报写出《卖报歌》

1922年6月15日，苏州盘门一户杨姓人家生下了一个女婴，家人叫她“小毛头”。“小毛头”的父亲在她出生时就已病故。1931年，“小毛头”跟随母亲、姐姐和姐夫逃难到上海。

在旧时上海滩的马路和街上到处可听到“卖报！卖报！”的叫卖声。为了谋生，“小毛头”的姐夫把一件皮大衣卖掉，再凑点钱做本钱，去批来报纸，由母亲和姐姐到吕班路霞飞路口摆了个报摊，当时还不满10岁的“小毛头”也跟着一起卖报，开始了报童生涯。

1933年6月的一天，“小毛头”饿得头昏眼花，摇摇晃晃的时候，一辆电车靠站，一批人从电车上涌下来，“小毛头”被撞倒在地，头上起了血泡，手上的报纸散乱一地，“小毛头”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时一个陌生的叔叔帮她拾起了报纸，还扶她起来，把弄脏的报纸都买走了。这人就是聂耳，他当时与友人一起到萨坡赛路的球场打球，正巧途经此地。这一天也成了“小毛头”命运改变的开始。

以后聂耳常来买她的报纸，有时还帮她一起叫卖报纸。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小毛头”亲热地叫聂耳“聂叔叔”，聂耳也和家人一样唤她作“小毛头”。

聂耳非常同情“小毛头”的身世，“小毛头”在风雨中卖报的情景和叫卖声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于是，他请田汉的夫人安娥写了一首歌词，他自己作曲，一首朗朗上口的《卖报歌》就这样诞生了！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卖报歌》从此在上海唱响。聂耳还亲自教“小毛头”唱《卖报歌》，“小毛头”边卖报边唱《卖报歌》，吸引不少路人驻足，卖报的生意也好了许多。

1934年，聂耳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公演，他邀请“小毛头”上台演出，担任剧中卖报童一角。在舞台上，“小毛头”放开嗓子高唱《卖报歌》，从此这首歌更是广为传扬。

据《档案春秋》瞿铭荣/文

